

金融减贫效率的区域差异研究

张强

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宝鸡

【摘要】金融减贫效率对精准扶贫工作效果具有重要衡量意义。基于全要素生产力的视角，选择相关金融指标数据，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测度了 2016-2020 年间全国 26 个省的金融减贫效率值，并通过全要素生产力指数的分解，讨论了各省金融减贫效率的变化和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全国金融减贫全要素生产率仍有待提高，而稳定的国内金融环境是其条件保障。（2）区域金融减贫效率存在地区差异：西部省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总体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因此，应通过发展高质量的普惠金融和产业金融扶贫进一步提升金融减贫效率。

【关键词】金融减贫效率；全要素生产力；区域差异；Malmquist 指数

【收稿日期】2024 年 5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6 月 28 日 **【DOI】**10.12208/j.jmba.20240002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inancial poverty reduction efficiency

Qiang Zhang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anxi

【Abstract】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poverty reduction has a measure of the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Financial Indicators from 2016 to 2020, by using DEA-Malmquist exponential model, through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alysis, the Change of financial poverty reduction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26 Provinces of China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inanci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China, the condition is a stable financial environment. (2) The regional financi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shows a spatial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with the highest efficiency value in the west, followed by the East and the lowest in the middle.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high-quality inclusive finance and encourag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poverty reduction.

【Keywords】Financial poverty reduction efficienc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DEA-Malmquist Index

贫困问题是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普遍问题，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到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急剧减少，截止到 2020 年底我国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十四五期间需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受新冠疫情影响，目前扶贫工作仍然艰巨，扶贫区域广且程度深，全国还存在 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区，涵盖了国土面积的相当部分。随着普惠金融发展与研究深入，金融对消除贫困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越来越明显，金融扶贫的方式也从单一资金支持到系统金融服务转变。金融减贫效率反映了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金融资源对贫困消除做出了最大可能程度的利用，是金融减贫效果衡量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的目的在于利用 DEA 数据包络法和 Malmquist 生产力指数分解的方法，讨论金融减贫效率问题，试图以金融全要素生产率分析考察金融生产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金融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具体影响程度，以期金融深度广度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1 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减贫的基础理论, 概括来说主要有平衡增长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及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等等。关注点在于通过金融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就业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 从而达到减贫。Beck T 等 (2007) 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可以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 并减少收入不平等, 而这种扶贫主要源自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进而得出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贫困减少”的重要结论^[1]。申云等 (2016) 指出金融减贫的机理主要在于通过扩大金融供给的普惠性和覆盖面促进经济发展, 实现财富增加进而达到普惠性减贫的目的^[2]。Fowowe (2013) 和 Khan (2012) 通过非洲国家和巴基斯坦的实证分析, 发现减贫并不是直接源自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作用, 更多是因为就业机会增加所带来的贫困人口收入提高, 但就业增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3-4]。还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 金融发展会导致资源错配, 加剧收入不平等, 进而使得贫困深度扩大。Pan L (2012) 研究发现, 由于“精英俘获”现象和信贷资源瞄准偏误的存在, 从扶贫项目的目标绩效上来看, 政府的扶贫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资源的错配, 使得非贫困户和贫困户的收入差距拉大, 同时在获取信贷支持方面, 非贫困户比贫困户相对容易, 这都不利于减贫绩效目标实现^[5]。杨俊等 (2008) 认为金融资源的“嫌贫爱富”倾向呈现出“U”型关系, 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临界值水平, 低于临界值水平时金融发展水平会减少贫困发生, 超过临界值的金融发展水平却会加剧贫困发生^[6]。

关于金融减贫效应研究, 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减贫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产生及影响上, 直接效应体现在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贫困人口劳动力回报率提高和就业增加, 即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消除贫困。间接效应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等方面。朱一鸣等 (2017) 研究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 但增收的效应对不同收入阶层群体存在差异性, 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促进减贫增收的重要机制^[7]。单德朋等 (2016) 认为金融的可获得性影响减贫效应, 贫困人口对正规金融工具使用及有效都有利于推动贫困人口的收入提升^[8]。苏鹏等 (2014) 研究指出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农户的金融信贷可获得性取决于农村金融的发展^[9]。

黄英伟等 (2015)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金融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放松企业家面临的融资约束, 来增强其创造就业的能力^[10]。姚耀军等 (2014)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而经济增长通过涓流效应, 即经济增长的益处会自动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渗透, 从而减缓贫困, 但在收入分配恶化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并非自发地有利于穷人^[11]。李建伟 (2017) 认为金融作为要素流通和资源位置的载体, 其发展水平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明显, 主要通过降低门槛效应、提升减贫效应、减缓非均衡效应三种途径来实现对贫困人口的普惠性^[12]。

关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差异的研究, 该研究一方面关注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及途径, 一方面关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测度。其中, 金融资源合理配置集中在以信贷为代表的金融获得性优化配置和提升措施制定上, 金融效率的有效测度则集中于不同衡量工作方法的选择上, 由于选择方法的不同, 各种方法的侧重不同, 数据支持的差别, 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差异, 但都能反应金融减贫效率的变化。陈银娥等 (2018) 研究认为我国各地区农村金融扶贫效率整体水平不高, 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受区域内差异影响较大^[13]。赵洪丹等 (2015) 利用带参数生产函数模型, 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14]。黄琦等 (2016) 运用 DEA 模型方法分析了秦巴山中连片特困区金融扶贫效率和形态分布, 并提出了应以优化金融资源投入作为精准化金融扶贫的建议^[15]。另外, 国家金融扶贫有关调研组 (2016) 也提出了下一步金融扶贫工作的目标、理念和建设多层次、多类型、分工、分责的扶贫金融体系。

综上所述, 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金融与贫困关系、某一具体的金融形式对贫困减缓影响、以及金融体系的建设等方面, 侧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证具体的表现。这为金融减贫效率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比较好的研究方法视角, 但有关金融减贫效率及区域差异分析的文献仍显不足。因此, 借鉴有关研究成果, 基于省域层面 2016-2020 年的相关数据, 运用 DEA—Malaqumist 指数模型测度全国 26 个省份金融减贫效率及其区域差异, 以期为提高金融减贫效率、缩小区域差异及金融政策制定提供参

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金融减贫可以看成是一个由金融资源要素作为投入和贫困消除作为产出的系统，此系统主要的功能是将金融资源转为现实生产力，进而产生经济效益，评价金融减贫的有效程度，即就是要判断在一定的金融资源投入条件下，金融减贫机制的运行效率，若是在较少的金融资源配给下，实现了较大的贫困减少，则称金融减贫系统运行效率高。金融减贫效率的 DEA 分析是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来评价金融资源使用的有效性，指出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度。

2.1 DEA—BC² 模型

DEA—BC² 模型是 DEA-C²R 基本模型的改进，是对考虑了规模报酬可变条件的决策单元（DMU）相对效率的分析评价，即就是决策单元（DMU）技术无效率除了来自投入产出配置不当的因素外，也可能来自决策单元（DMU）的规模因素，可以调整规模因素以改进来无效率的状态。

假设有 n 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都有 m 种类型的“输入”和 s 种类型的“输出”，用 x_{ij} 代表第 j 个决策单元第 i 种类型输入的投入量， y_{rj} 代表第 j 个决策单元 r 种类型输出的产出量，在引入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ε ，投入松弛变量 s^- 产出松弛变量 s^+ 后，最终模型表述为：

$$D_\varepsilon \begin{cases} \max[\theta - \varepsilon(\hat{e}^T s^- + e^T s^+)] \\ s.t. \sum_{j=1}^n x_j \lambda_j + s^- = \theta x_0 \\ \sum_{j=1}^n y_j \lambda_j - s^+ = y_0 \\ \sum_{j=1}^n \lambda_j = 1 \\ s^- \geq 0, s^+ \geq 0, \lambda_j \geq 0, j = 1, 2, \dots, n \end{cases} \quad (1)$$

其中，

$$\begin{aligned} x_j &= (x_{1j}, x_{2j}, \dots, x_{mj})^T, y_j = (y_{1j}, y_{2j}, \dots, y_{sj})^T \\ x_j &\in E^m, y_j \in E^s, x_j > 0, y_j > 0 \\ \hat{e}^T &= (1, 1, \dots, 1) \in E^m, e^T = (1, 1, \dots, 1) \in E^s \\ s^- &= (s_1^-, s_2^-, \dots, s_m^-)^T, s^+ = (s_1^+, s_2^+, \dots, s_r^+)^T \end{aligned}$$

由 DEA 有效性与 pareto 最优之间的等价关系，取 $\varepsilon = 10^{-6}$ ，利用单纯形法求解（ D_ε ），可得以下判

断结论：设 ε 为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并且线性规划问题 D_ε 的最优解为： $\lambda^0, s^{-0}, s^{+0}, \theta^0$ 。若 $\theta^0 = 1$ ，并且 $s^{-0} = 0, s^{+0} = 0$ ，决策单元 j_0 为 DEA 有效，决策单元 j_0 的生产活动技术效率最佳；若 $\theta^0 = 1$ ，决策单元 j_0 为弱 DEA 有效，决策单元 j_0 的生产活动非技术效率最佳。若某个 $s_i^- > 0$ ，表明第 i 种投入指标有 s_i^- 那么多的闲置；若某个 $s_r^+ > 0$ ，表明第 r 种产出指标有 s_r^+ 那么大的产出不足。

2.2 Malmquist 指数

Malmquist 指数是被广泛运用于生产分析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可以用来测度金融减贫效率。该指数假设每个决策单元面对同样的技术前沿，通过计算由投入和产出描述的决策单元生产率水平到技术前沿距离的相对变化，来度量决策单元生产效率的提高，并进一步将生产效率的提高分解为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根据 Fare（1994）所定义的两观察期 Malmquist 生产力指数：

$$M(x_t, y_t, x_{t+1}, y_{t+1}) = \left[\frac{D_t(x_{t+1}, y_{t+1})}{D_t(x_t, y_t)} \frac{D_{t+1}(x_t, y_t)}{D_{t+1}(x_{t+1}, y_{t+1})} \right]^{\frac{1}{2}} \quad (2)$$

(2)式中， x_t, y_t 为 t 时期的投入和产出， $D_t(x_t, y_t)$ 为 t 时期技术水平距离函数， $M(x_t, y_t, x_{t+1}, y_{t+1})$ 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将此式分解可得：

$$M(x_t, y_t, x_{t+1}, y_{t+1}) = \frac{D_{t+1}(x_{t+1}, y_{t+1})}{D_t(x_t, y_t)} \left[\frac{D_t(x_{t+1}, y_{t+1})}{D_t(x_t, y_t)} \frac{D_{t+1}(x_t, y_t)}{D_{t+1}(x_{t+1}, y_{t+1})} \right]^{\frac{1}{2}} \quad (3)$$

(3) 式中等号右边第一项为技术效率变动（TEC），第二项则为技术变动（TC），两项都为全要素（TFP）的分解项。TEC 衡量技术效率的跨期变动，表示投入产出水平相对于生产前沿面的产出水平距离的跨期比值，当此值大于 1 时，代表决策单元产出水平更贴近于生产前沿水平，同时，该项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E）和规模效率（SE），TC 表示生产前沿函数随时间的变化上下移动，若其值大于（小于）1，则表示决策单元生产函数是向上（向下）移动，即技术进步或者衰退。DEA 的技术正好可以用来求解 Malmquist 指数，从而对决策单元的效率问题加以动态分析。

3 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用于衡量金融与贫困的指标有很多选择，不同的学者因研究的视角不同，在指标的选取上存在一

定的区别。但就金融减贫效率的来看,所选指标一是能够表明金融服务贫困地区的情况,体现金融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效率。二是能够表明金融与贫困减除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罗斯丹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度、使用效用、渗透度、承受度四个维度选取 9 项指标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体系,对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综合,其核心在于通过金融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范围广度化、服务高质量化来体现金融发展水平^[6]。而对于贫困的度量,常用的指标有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和贫困缺口的平方等^[7],由于引起贫困的原因复杂,与金融的相关不明显,这类指标用于衡量金融减贫效率不够准确。而金融减贫的机理表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就业增加可以减除贫困,且与金融水平明显相关。同时鉴于银行业的主体金融业地位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从金融水平(投入)和贫困消除(产出)两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DEA 模型分析的基础要求所选投入和产出指标间存在相关性,且样本数不少于指标个数和的 2 倍,以避免所有样本单元的全部 DEA 有效。因此,标准化处理变量后,对所选指标的 Pearson 相关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经济增长与银行网点密度在 0.05 水平上具有较强相关性,与银行从业人员密度、小额贷款余额在 0.01 的水平上表现出强相关性。就业增加与银行网点密度、银行从业人员密度在 0.01 的水平上表现出强相关性,与小额贷款余额 0.05 水平上具有较强相关性。收入分配与银行网点密度、银行从业人员密度、小额贷款余额在 0.05 的水平上具有负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在减小,主要得益于贫困人口获得金融服务的水平有所增加。指标间均存在一定相关性,可以利用所选方法分析金融减贫效率问题。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全国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泰安数据库和人民银行门户网站。

4 金融减贫效率的实证分析

基于所选方法,对金融减贫的效率进行测度,依据 DEA 模型确定生产前沿面的原理,主要从产出(贫困减少)的角度分析金融全要素生产率,即投入一定,产出越大效率越高。

4.1 金融减贫的总体效率分析

使用收集的数据和 DEAP2.1 软件,分析全国 26 各省份 2016—2020 年间金融减贫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原因,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1 金融减贫效率指标体系

层面	指标	指标值	表示
金融水平 (投入)	银行网点密度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	X ₁
	银行业从业人员密度	银行金融结构的从业人数	X ₂
	贷款余额	小额贷款余额占人均 GDP 的比率	X ₃
贫困消除 (产出)	经济增长	区域人均 GDP	Y ₁
	就业增加	区域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值	Y ₂
	收入分配	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比率	Y ₃

表 2 指标相关性分析结果

	Y ₁	Y ₂	Y ₃
X ₁	0.418*	0.928**	-0.364*
X ₂	0.547**	0.856**	-0.439*
X ₃	0.719**	0.378*	-0.355*

**和*分别表示 0.01、0.05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3 金融减贫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年份	技术效率 TEC	技术变动 TC	纯技术效率 PE	规模效率 SE	全要素生产率 TFP
2016-2017	1.001	0.898	0.996	1.005	0.899
2017-2018	1.003	0.971	0.998	1.006	0.974
2018-2019	0.987	0.981	0.997	0.991	0.969
2019-2020	0.987	1.014	0.995	0.992	1.001
平均值	0.995	0.965	0.996	0.998	0.960

由表 3 可以看出,金融减贫全要素效率略有起伏,但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从 2016—2020 年间动态过程来看,金融减贫的全要素生产率逐年上升提高,主要受技术变动效率提高和技术效率下降的影响,而且技术变动指数的增长率大于技术效率的下降率。全要素生产率由 2016 年

的 0.899 上升到 2020 年的 1.001, 增长了 10.2%, 原因在于同时期的技术变动指数增长了 11.6%。但 5 年中金融减贫效率平均值为 0.96, 平均下降 4%, 出现了负增长的不利情况。除 2020 年外, 其余年份的效率测算值均未能达到 DEA 有效, 说明了金融减贫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为非最佳生产水平。

金融减贫的技术效率变化呈不规则趋势, 具有波动性。如图 1 所示, 可以发现 2016-2017 年、2017-2018 年分别增长了 0.1% 和 0.3%, 但是到 2018-2019 年和 2019-2020 年却又下降了 1.3%。作为分解项的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稳定, 纯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 由 2016 年的 0.996 下降到 2020 年的 0.995, 年均下降 0.4%。规模效率呈不规则趋势, 2016-2017 年、2017-2018 年分别增长了 0.5% 和 0.6%, 2018-2019 年和 2019-2020 年却又分别下降了 0.9%、0.8%, 与技术效率变化趋势一致, 技术

效率变化趋势表明金融减贫还缺少比较好的实现路径。从三者效率变化的平均值来看, 技术效率年均下降 0.04%,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年均下降 0.5% 和 0.02%, 技术效率的变动受规模效率影响明显, 说明金融发展规模对减贫有重要作用。

技术变动造成金融减贫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2016-2020 年间技术变动逐年呈上升趋势, 由 2017 年的 0.898 提高到 2020 年的 1.014, 增长了 11.6%, 这对金融减贫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16-2020 年间技术效率下降并趋于平稳,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水平在这时期的快速增长。观察图 1 可以发现, 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线随着技术变动的趋势线变化而变化, 技术变动上升时全要素生产率也上升, 反之也一样。这样的现象也说明, 金融发展水平变动与金融减贫的效率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要取得减贫效率的提高, 必须提升金融技术进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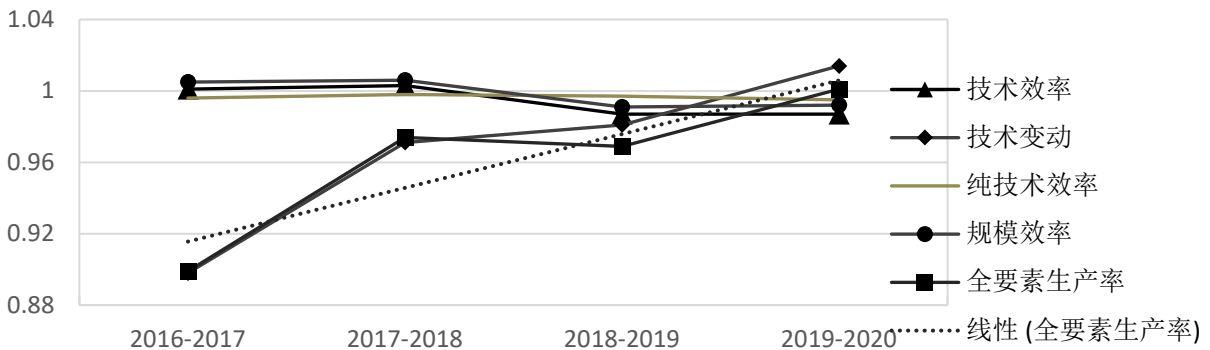


图 1 金融减贫效率指数变化

4.2 金融减贫的区域效率分析

全国主要省区的金融减贫全要素生产效率值较高, 减贫效果显著。从表 4 观察可以发现, 2016 年—2020 年间全国 26 个省区金融减贫效率的平均值达到 0.96, 处于高水平阶段。其中有 4 个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值超过 1, 达到 DEA 最优。在所有省区约占比 15.4%, 分别是新疆、宁夏、内蒙古、吉林, 说明该 4 省区近年来在金融减贫过程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合理且高效。有 2 个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 0.9, 处于较低水平, 所占比重约为 7.7%, 分别是甘肃、四川, 说明这两省的金融减贫要素投入与产出结构不尽合理, 有待完善。其余 20 省的减贫效率值都维持在 0.96 上下, 处于较高水平, 占比 76.9%, 说明

这 20 省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需不断优化。各省份金融减贫效率地区差异不大, 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家金融体系建设和精准扶贫战略实施, 以及创新金融扶贫方式、增加金融扶贫投入、提升普惠金融水平等系列措施所产生的良好效果。

各省区金融减贫技术效率变化。从技术效率分解来看, 一是纯技术效率, 新疆、河北 2 省效率值超过 1, 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四川、黑龙江、广西、辽宁等 9 省区效率值小于 1, 说明新疆、河北 2 省区比浙江等 9 省明显具有金融减贫的技术优势。其余吉林等 10 省效率值等于 1, 为 DEA 有效。二是规模效率, 吉林、新疆、黑龙江、江苏、内蒙古、宁夏、浙江、福建、山西、辽宁、云南、河南、海南、

青海、湖南等 15 省区效率值大于等于 1, 为 DEA 有效。贵州、江西、安徽、湖北、广东、山东、甘肃、广西、河北、陕西、四川等 11 省区效率值小于 1, 反映出这 11 省为负增长, 金融减贫投入产出的比例不相符, 说明该 11 省金融要素投入不足, 还应加大投入力度。各省区技术变动效率值除宁夏外均小于 1, 说明绝大部分省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再次利用 deap2.1 分年度对 26 个省区金融减贫规模报酬进行测度, 以比较不同省区规模报酬变化的情况, 结果发现, 26 个省份中 7 个省区处在规模报酬不变状态, 19 个省区处在规模报酬递减状态, 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投入冗余情况。也就是说某省区较高的金融减贫效率是由于过多的金融

投入导致。各指标具体的效率值详见表 4。

4.3 金融减贫效率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分类的方法, 它是根据样本统计特征值, 利用空间距离定义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 按相似程度大小把样本聚合成一类。因此, 针对样本省区, 按其金融发展水平(技术变动效率)、技术效率及金融减贫的有效性等因素来总结每一类省区的特征和原因。选择 2012-2016 年间反映金融减贫状况的技术效率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运用 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可得。从系统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 涉及全国 26 个省区可以划分为 4 个大类, 详细的层类如表 5 所示。

表 4 各省区金融减贫效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省份	技术效率	技术变动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规模报酬
陕西	0.945	0.983	0.994	0.95	0.929	递减
甘肃	0.983	0.912	1	0.983	0.897	递减
青海	1	0.919	1	1	0.919	递减
宁夏	1.009	1.004	1	1.009	1.012	不变
新疆	1.049	0.984	1.019	1.029	1.032	递减
四川	0.933	0.915	0.987	0.945	0.853	递减
贵州	0.995	0.931	1	0.995	0.926	不变
云南	1	0.978	1	1	0.978	不变
广东	0.989	0.987	1	0.989	0.976	递减
广西	0.958	0.973	0.978	0.98	0.932	递减
海南	1	0.923	1	1	0.923	不变
江苏	1.015	0.973	1	1.015	0.988	递减
浙江	1.005	0.975	0.998	1.008	0.981	递减
安徽	0.994	0.966	1	0.994	0.96	不变
福建	1.003	0.984	1	1.003	0.988	递减
江西	0.993	0.988	0.997	0.995	0.981	递减
山东	0.987	0.987	1	0.987	0.974	递减
河南	1	0.975	1	1	0.975	不变
湖北	0.985	0.983	0.994	0.991	0.969	递减
湖南	1	0.911	1	1	0.911	不变
河北	0.984	0.994	1.007	0.977	0.978	递减
山西	0.991	0.988	0.988	1.003	0.979	递减
内蒙古	1.01	0.998	1	1.01	1.008	递减
辽宁	0.966	0.989	0.964	1.001	0.955	递减
吉林	1.081	0.927	1	1.081	1.002	递减
黑龙江	1.001	0.955	0.98	1.021	0.956	递减

表 5 各省区金融减贫聚类结果

类别	I	II	III	IV
省区	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广东、山东、河北、湖北、河南、山西、云南	陕西、广西、辽宁、青海、海南、贵州、湖南、黑龙江	新疆、吉林、内蒙古、宁夏	四川、甘肃

第一层类：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增长较好。以江苏、浙江、广东为代表，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效率都领先其他省区，这类省区中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机构数量和从业人数都优于其他省区。同时，该类地区多集中于全国的东中部，也符合全国金融发展水平东中部高于西部的的基本判断。而云南省在 2012-2016 年间技术效率值年均 1，减贫效率变化完全是由省域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决定。

第二层类：金融发展水平中等，经济总量一般。该地区多在西部或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水平中等，技术效率也未能达到最优，总体的减贫效率由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但黑龙江和辽宁明显有金融资源投入过度的现象，需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提高资源使用率。

第三层类：金融减贫的有效性高。该类地区的金融全要素生产效率值和技术效率值均超过 1。其中内蒙古、新疆和吉林 3 个省份的技术效率 5 年来持续增长。说明金融精准扶贫战略在该类地区实施效果明显，5 年来贫困人口的金融获得性较高，一方面，内蒙古、宁夏、吉林、新疆等地 2012-2016 年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下降 6.5%、14.3%、7.2%、0.3%，另一方面，小额金融贷款余额也逐年下降。

第四层类：金融减贫的有效性低。四川和甘肃处于西部内陆地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均不高且全要素生产效率值均低于 0.9。说明这两省的金融与减贫融合发展不够。两省还存在金融规模报酬递减，说明不能一味的在金融资源的投入数量上下功夫，还要进一步调整投入方向和结构，改善金融结构质量效率，实现金融规模经济效应最大化。

5 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全国主要省份金融减贫效率的视角出发，利用生产前沿面的效率概念，对全国 26 省区的金融减贫效率进行了 DEA 测算，了解全国主要省份之间的金融减贫效率和金融水平。并通过 Malmquist 生

产力变动指数的分解，讨论了各省区金融减贫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区域间减贫效率差异。

研究发现：（一）金融减贫的全要素生产效率还存在提升空间。2016-2020 年间全国金融减贫的有效率指数累计增长只有 10.2%，还存在继续提高的空间。从金融减贫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情况来看，其中技术效率虽然具有波动性，但波动范围较小且总体趋于稳定。代表宏观金融环境的技术变动指数累计增长了 11.6%，说明金融减贫效率的提升与良好的宏观金融环境明显相关。此外，稳定向好的宏观金融环境也说明金融减贫实施过程中不存在金融风险的影响。（二）金融减贫效率存在地区差异。各省区的效率变化表明，西部省区金融减贫的效率最高，东部省效率值次之，中部省区效率值最低。这也说明金融减贫效率与地区经济增长不完全相关，经济效益大的地区不一定减贫效率高。人均 GDP 排名前两位的江苏省和浙江省，其金融减贫的效率并未达到最优水平，而人均 GDP 靠后的新疆、宁夏的减贫效率值反而达到最优。在各省区普遍存在金融报酬规模递减情况下，这样的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既就是以减贫效果为基础来看，西部省区处于最优的金融发展水平阶段。另外，地区差异还主要表现为非均衡性，全国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得出金融减贫效率提高的两点启示。第一，在新时期，要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普惠金融，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实现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一是要提高金融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现代数字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拓展金融服务的形式和范围，提高贫困人口的金融获得性和满意度。二是进一步优化配置普惠金融资源，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大新型金融机构网点建设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金融扶贫提供有效支撑。中西部地区重在发挥政

策金融作用,东部地区则以金融扶贫形式创新为主。第二,立足产业发展来提高金融扶贫精准度。精准扶贫的关键是要落实到产业,一是积极推动金融服务贫困地区产业尤其是地域特色优势产业建立生产基地和落实精准扶贫项目到户,以提高贫困地区人员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二是要加强金融与产业的有机融合,金融机构要努力改善信贷制度设计,通过产业链金融为产业上下各环节提供金融服务,以增强产业扶贫的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 [1] Beck T, Asli Demirgüç-Kunt, Levine R. Finance, inequality and the poor[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1):27-49.
- [2] 申云,张尊帅,贾晋.农业供应链金融扶贫研究展望—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文献综述及启示[J]. *西部论坛*,2018(5):30-36.
- [3] Fowowe B, Abidoye B.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African countries [J]. *The Manchester School*,2013, 81(4):24.
- [4] Khan AD, Ahmad 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Pakistan[J]. *World Applied Sciences Journal*, 2012,18(11): 1576-1581.
- [5] Pan L , Christiaensen L . Who is Vouching for the Input Voucher? Decentralized Targeting and Elite Capture in Tanzania[J]. *World Development (Oxford)*, 2012, 40(8): 1619-1633.
- [6] 杨俊,王燕,张宗益.中国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 2008,(8):26-32.
- [7] 朱一鸣,王伟.普惠金融如何实现精准扶贫?[J]. *财经研究*, 2017(10):45-56.
- [8] 单德朋,郑长德,王英.金融可得性、信贷需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机制及研究进展[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9) : 127-134.
- [9] 苏鹏,孙巍.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限回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2):91-99.
- [10] 黄英伟,陈永伟.金融发展与就业促进:理论和实证[J]. *劳动经济研究*, 2015(1):96-118.
- [11] 姚耀军,李明珠.中国金融发展的反贫困效应:非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实证检验[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4(1):69-76.
- [12] 李建伟.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 2017(10):14-23.
- [13] 陈银娥,金润楚.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效率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04):30-40.
- [14] 赵洪丹,朱显平.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来自吉林省的证据[J]. *经济经纬*, 2015(3):28-34.
- [15] 黄琦,陶建平.扶贫效率、形态分布与精准优化:秦巴山片区例证[J]. *改革*,2016(5):76-88.
- [16] 罗斯丹,陈晓.基于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我国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5(10):10-16.
- [17] 卢盼盼,张长全.中国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J]. *宏观经济研究*,2017(08):33-43.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